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会议文件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会议文件集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菲舍尔注释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
1971 届工农兵学员译 教师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ТЕГЕРАН · ЯЛТА · ПОТСДАМ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здание 3-е

Составители : Ш. П. Санаков, Б. Л. Цыбулевск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1

Teheran Jalta Potsdam

Die sowjetischen Protokolle von den
Kriegskonferenzen der »Großen Drei«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Alexander Fischer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Köln, 1973

根据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 1971 年第三版译出，
并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伦科学与政治出版社德译本
1973 年第二版增译注释。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菲舍尔注释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

1971 届工农兵学员译。教师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396,000 字

1978 年 3 月第 1 版 197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02·489 定价 1.6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译自苏联 1971 年出版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并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3 年出版的德译本增译注释。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英三国首脑会晤商谈作战问题和战后国际政治问题的三次重要会议。三国首脑在这些会议上达成的许多协议和作出的许多决议，对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历史的重要资料。关于这些会议的情况，美、苏两国先后公开发表过自己的会议记录。双方都从各自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历史记录进行取舍和删改，材料有不少出入。

三次会议的美方记录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业局汇编，于 1955 年、1960 年、1961 年分别出版。苏方记录最初是在 1961—1966 年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的，后来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编成单行本，分别于 1967、1970、1971 年三次印行。编者在第二、三版增添的前言中，适应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利用三次首脑会议的材料，大肆鼓吹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吹嘘苏军能“独自”解放欧洲，抹杀欧洲各国人民对击败德国法西斯所作的重大贡献，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控制其他国家辩护；宣扬战争恐怖，鼓吹修正主义的和平共处理论；吹捧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并影射攻击我国的对外政策，等等。现将俄文版前言全文译出，供读者批判研究。

1967 年苏方记录初版问世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伦科学与

政治出版社于1968年把它译成德文出版,并在1973年再版发行。德译本对美、苏双方的记录进行对照,用大量的注释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德译本引言还对苏修公开发表会议记录的目的和删改历史材料的动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把德译本中的全部注释和引言的主要内容一并译出,供对比研究之用。由于这些注释和前言是以资产阶级观点编写的,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的正文部分由北京外语学院俄语专业1971届八、九班工农兵学员在部分教师指导下从俄文译出,德文注解部分由德语专业同届的部分工农兵学员在部分教师指导下从德文译出。俄文原书中有少量阐释性的注解,我们加了*号。德译本的注释则分会议编号排在页末。每次会议前根据德译本补充了开会地点、时间和与会者名单。书后采用了德译本的人名和其他名目索引,以便查找。边码是德译本的页码。本书翻译时曾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有关文件摘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

目 录

俄文版编者序言	1
德译本引言(摘要)	27
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31—128
约·维·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1月28日)	33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 会议(11月28日)	39
军事代表会议(11月29日)	53
约·维·斯大林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1月29日)	67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 会议(11月29日)	74
约·维·斯大林同丘吉尔的谈话记录(11月30日)	90
午餐时的会谈(11月30日)	96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三次 会议(11月30日)	100
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四次 会议(12月1日)	105
德黑兰会议文件	124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同盟国领导人 德黑兰会议公报	124
三国宣言	125
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126
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2月4日—11日)	129—258
里瓦基亚宫第一次会议(2月4日)	131

里瓦基亚宫第二次会议(2月5日)	145
里瓦基亚宫第三次会议(2月6日)	166
里瓦基亚宫第四次会议(2月7日)	186
里瓦基亚宫第五次会议(2月8日)	198
里瓦基亚宫第六次会议(2月9日)	212
里瓦基亚宫第七次会议(2月10日)	226
里瓦基亚宫第八次会议(2月11日)	237
克里米亚会议文件	242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三盟国领导人	
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242
克里米亚会议议定书	250
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	259—528
第一次会议(7月17日)	261
第二次会议(7月18日)	276
第三次会议(7月19日)	289
第四次会议(7月20日)	312
第五次会议(7月21日)	331
第六次会议(7月22日)	352
第七次会议(7月23日)	377
第八次会议(7月24日)	394
第九次会议(7月25日)	415
第十次会议(7月28日)	426
第十一次会议(7月31日)	441
第十二次会议(8月1日)	470
第十三次(最后一次)会议(8月1日)	490
波茨坦会议文件	505
三国柏林会议公报	505
三大国柏林会议议定书	522
人名和其他名目索引	529—539

俄文版编者序言

收进本书的文件所记载的事件，距我们今天已经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了。战后数十年来，不仅在战争年代的废墟和灰烬上兴建起了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和一座座完整的城市，而且一代新人也已经长大成年。对于他们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战争只不过是课本上的章节，文学作品中的片断和电影上的画面而已。然而，时间尽管流逝，人民却记忆犹新，人们对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的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关注并未减退，每出现一本反映这一时期的内容真实而又丰富的新书，都会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1967年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了《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一书。这是一本反希特勒同盟的三国首脑在德黑兰（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雅尔塔（1945年2月4日至11日）和波茨坦（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的三次会议的文件汇编。尽管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国会议的苏方记录（众所周知，这几次会上并没有任何统一的记录或速记，而是各代表团分别做的记录）早在1961—1966年期间就在我国的《国际生活》杂志上首次发表了，但这本书仍然受到极大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很快就抢购一空。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一书问世之后，编辑部收到许多来信。写信的读者们，年龄、职业和专业都极不相同，但他们都指出这本文件汇编具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并要求将此书加序再版，大量发行。

在有重要意义的 1970 年,当苏联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庆祝粉碎法西斯德国二十五周年时,《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一书第二版问世了。书中补充了约·维·斯大林于 1943 年在德黑兰同富·罗斯福和温·丘吉尔进行的几次谈话的记录,增加了本书编者的序言和人名、地名索引。

增订后的第二版同样深受欢迎,得到社会各界以及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好评。此次第三版在内容上与第二版没有什么不同。

汇编提供的文件雄辩地说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保证彻底战胜敌人并建立公正与稳定的和平,在对外政策和外交方面进行了多么巨大的工作。

读者对所发表的文件怀有很大兴趣,是因为在德黑兰、克里米亚(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三国领导人会议在外交史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三巨头”会谈的资料证明,这几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反希特勒同盟国家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斗争中同心协力。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不仅缩短了战胜共同敌人的时间,而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奠定了战后世界结构的基础。三国首脑会议具体表明,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

战后年代里,西方干了大量篡改同盟国会议的精神和内容,歪曲会议决议含义的勾当。五花八门的《文件资料汇编》、“目击者”的大量回忆录、书籍、小册子和文章都为此效了劳。美国和大不列颠的许多作者力图以自己的研究著作作为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反动方针辩护,竟然企图歪曲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正是苏联承担了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主要负担,为战胜法西斯的

事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们围绕着盟国会议进行了种种投机，当然，他们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尝试还不止于此。

为了歪曲苏联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贬低苏军胜利的意义，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家们散布了种种关于希特勒是犯了“千古大错”的谬论，炮制出了违反历史事实的一些“战争转折点”的时间表，如此等等。

譬如，有些人千方百计地兜售德国的失败带有偶然性的观点。希特勒的元帅曼施坦因在《失掉的胜利》一书中就企图证明，如果希特勒听取了军事专家们（当然也包括曼施坦因本人）的忠告，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就可完全改观。

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大肆吹捧英美军队在非洲和远东的胜利，而谈到苏德战场上的战事时，却一笔带过。这样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就不是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这样一些给战争进程带来根本转折的大仗，而是 1942 年 10 月英国军队在北非战胜德、意的隆美尔兵团的阿拉曼战役以及珊瑚岛与中途岛战役了。

例如，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富勒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对希特勒德国的几次胜仗的：首先是太平洋中途岛的海战，其次是阿拉曼的胜利和英美军队在非洲的登陆，最后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①

当然，诸如此类的“观点”是不值一驳的。至于对盟国之间几次会议上谈判过程的叙述，说得客气些，也同样是极不公正的。譬如，为了曲解德黑兰会议的实质和意义，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一种论调，说“罗斯福向斯大林作了让步”，结果使丘吉尔和他的军事政

^① 参阅乔治·富勒：《1939—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 1966 年版，第 313 页。（序言中的注都是序言作者加的。——译者）

治纲领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战后最初几年,美国把克里米亚会议称作“三巨头团结一致的顶峰”,并肯定了会议的结果,但后来,雅尔塔在美国反动历史学家笔下却成了叛卖的同义语,它被描绘成美英向苏维埃俄国投降的某种新“慕尼黑”。

对波茨坦会议的歪曲首先是在波兰边界问题上。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威尔莫特断言是“斯大林授权给波兰政府接管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而这条线总统和首相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的”^①。其实,众所周知,边界问题早在德黑兰和克里米亚会议上就已讨论过,而且正是在雅尔塔,达成了把奥得河以东的土地划归波兰的协议。^②

这仅仅是资产阶级学术界对历史真相进行粗暴歪曲的几个例子而已。

资产阶级学者们援引种种文献,俨然以“客观”的面孔出现,企图蒙蔽读者,首先是蒙蔽未曾经受法西斯横祸的青年一代,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大事件的过程和意义弄得面目全非。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一书中收集的资料为正确判断与会各国的政治方针和弄清它们在战时和战后的策略、战略目标开辟了途径。弄清楚反希特勒同盟各主要国家的真实立场和意图,不仅具有纯学术的和历史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这些会议的资料又一次证明:苏联始终不渝地忠于和平民主

① Ch. 威尔莫特:《争夺欧洲》,伦敦 1953 年版,第 708 页。

② 参阅《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国际关系出版社 1967 年版(以下简称:《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第 115、132 页〔参阅本书边码 133—134〕。

和进步事业，并为创造条件使德国纳粹军国主义永远不能复活和重新侵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苏联是力图为了各国人民的利益而公平合理地解决各种战后问题，并竭尽全力促进国际合作。

*

*

*

谈到三国会议，应该想到会议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在通往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道路上克服了多少巨大的困难。甚至筹备这些会议的过程本身都遇到很大的障碍，为筹备每次会议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也不仅局限在外交方面。苏军在卫国战争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往往迫使我们的谈判对手变得较为圆通一些。

问题不仅在于三大国之间在一系列根本性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还有种种其它困难，有时纯粹属于国家体面之类的问题。关于筹备三国政府首脑德黑兰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温·丘吉尔这样写道：“原则上达成了这次会议应在最近期间举行的协议，但是未参与此事的人无法想象，为了就这个后来被称作‘三巨头’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和条件达成协议，曾经经历了多少波折和不安”。^①

对于举行三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和以后几次会谈的地点问题，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譬如，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了他们认为方便的、他们所希望的一些开会地点。他们提出开罗、阿斯马拉、地中海东部的各港口、巴格达郊区、巴士拉等等。丘吉尔甚至建议在沙漠里举行会谈。1943年10月14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在沙漠里有个我现在称之为‘塞浦路斯’的地方，它的真正名字叫哈特巴尼亚，您从开罗到那里要比去‘开伊尔3’（德黑兰

^① 温·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伦敦1952年版，第272页。

的代号——序言作者）容易得多，而对于约大叔（约·维·斯大林——序言作者）也只不过稍微远些。我们可以在这里支起三座营房，会过得很舒服，绝对幽静而又十分安全。如三方都同意，我将进行具体安排”。^①

美国总统在给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信中则主要是说，由于宪法的原因，他不能久离国家。罗斯福给苏联政府首脑写道：“我必须遗憾地说，我，作为国家首脑，不能去我无法按照我国宪法履行自己职责的地方，……所以我必须十分抱歉地通知您，我不能前往德黑兰。我的内阁成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完全同意这一点。”^②在这封信中，罗斯福建议以巴士拉、阿斯马拉、巴格达甚至安卡拉作为拟议的会谈地点。

这一切证明，在准备举行三国首脑会谈的过程中要克服种种困难。不言而喻，这些困难不是纯技术性的。我们的盟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企图无视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现实，他们不是把事业的利益放在首位，而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

苏联政府一开始就认为德黑兰是三国首脑会谈最适宜的地方，它的理由是：苏军 1943 年夏秋展开的攻势进程表明，我军对德军的攻势能持续下去，因而形成了由夏季攻势发展为冬季攻势的局面。1943 年 10 月 19 日斯大林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同事都认为，这些战役要求最高统帅部进行持续不断的指挥，要求我本人与各司令部保持直接联系。在德黑兰，这些条件能得

① 温·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5 卷，伦敦 1952 年版，第 273 页。

②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及大不列颠首相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第 2 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1—102 页。

到保证,因为那里有有线电报和电话与莫斯科联系,而其它地方则不然。因此,我的同事坚持以德黑兰为会谈地点。”^①

经过长时间谈判,盟国终于同意在德黑兰会谈。应当指出,苏军多次的辉煌胜利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在这里也起了作用。我们的盟国亲眼看到苏军对敌人的打击与日俱增,它能够独自把欧洲从希特勒铁蹄下解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注意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讲的一段话,这段话明显地流露出这位不列颠首相对事态的发展和结局感到惶惶不安。他声称“1944年的战役将比迄今为止我们所进行的所有战役危险得多,我本人对这次战役的结局的担心也超过对1941年、1942年或者1943年的战役的担心”。^②

以后两次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地点问题,也成了认真谈判的题目。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得比筹备德黑兰会议时要快些。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形势迅猛发展,从而使欧洲出现了新的局面。到这时,我们的盟国自己就很关心这些会议的召开了。在这方面大不列颠首相表现得尤为积极。他对自己的美国同事不满,责怪他们“对于随着在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强大军队向前推进而急剧增强的共产主义影响觉察得太慢。”^③

丘吉尔对未来前景的恐惧和不安,随着对德国法西斯胜利的临近而增强。读到他关于战争后期的回忆录时,不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这时与其说是忙于进行战事,不如说是沉湎于思虑未来,并且主要是在密谋策划反对欧洲的民主运动,反对苏联,而正是伟大的苏联军队给欧洲人民带来了自由和独立。丘吉尔哀叹

① 《……通信集》,第2卷,第100页。

② 温·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第270页。

③ 同上书,第6卷,伦敦1954年版,第181页。

道：“在炮声隆隆的俄国战线背后，共产主义正在抬头。俄国成了救世主，共产主义则是它带来的福音。”^①在他的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已经是在劫难逃，但在希特勒之后，又将是什么呢？”^②

英美统治集团企图影响事态的发展，但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到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长的作用和威望。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苏联及其军队在粉碎法西斯匪帮中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所造成的客观现实。正是这些情况成了促使盟国政府进行谈判和高级会晤的主要原因。

1945年5月11日，即战胜德国两天以后，丘吉尔写信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说：“我认为，我们应当联名或者同时分别地邀请斯大林于7月份在我们商定的德国某个未遭破坏的城市会晤，以便进行三方会议。我们不应在目前俄国战区的某个地点会见。我们已经连续两次迎合了他。”同时他表示怀疑“有什么事情能促使斯大林出面提议举行三国会谈。”^③那时他满脑子想的已经是所谓东西方之间的“铁幕”了。就是这个“铁幕”在战后年代成为冷战的一种象征。伟大胜利后的第四天，丘吉尔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写道：“铁幕正在他们战线的上空降下，我们不知道在它的后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情。”^④

这些就是促使我们的盟国参加政府首脑会议的简单情况。在这几次会议上，讨论了直接关系到三大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

① 温·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伦敦，1954年版，第181页。

② 同上书，第182页。

③ 同上书，第496—497页。

④ 同上书，第6卷，第498—499页。

中进行军事和政治合作,以及战后体制的多方面的问题。

在盟国所讨论的重大军事问题中,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占有显著的位置。问题的始末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但西方的捏造者们至今不肯罢休,还企图为英美政府的政策涂脂抹粉,而对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加以歪曲。他们无视历史事实,力图证明无法证明的东西:似乎英美统治集团没有背弃他们和苏联达成的早在1942年就要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众所周知,在1942年6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在伦敦逗留期间,已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6月11日发表的英苏公报中指出:“在维·米·莫洛托夫同大不列颠首相温·丘吉尔会谈期间,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达成了完全的协议”。^①这里指的是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登陆。

后来,先是温斯顿·丘吉尔,而后是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都企图为背弃这一协议辩解,把它几乎说成是对希特勒德国的一种策略手腕。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到,这种公开的声明会造成德国人的疑虑,这就可以“把尽可能多的德国部队牵制在西线”^②。为了替自己的行为开脱,他抬出了他曾交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一份备忘录,似乎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没有使自己承担上述义务。可是,就连《备忘录》也帮不了他的忙。备忘录全文收进了英国首相的回忆录中,它一开头的原话就是:“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大

①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第一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年版,第284页。

② 温·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伦敦1951年版,第304—305页。

陆登陆进行准备”。^①

英美政府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他们是蓄意破坏了关于第二战场的既定协议。众所周知，丘吉尔 1942 年 8 月中旬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是要通知苏联政府，英美同盟国不打算开辟第二战场。临行之前，1942 年 8 月 5 日，他写信给罗斯福说：他面临一项“颇为棘手的任务”，并请求总统帮助他完成这一“棘手的任务”^②。在从德黑兰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他在飞机上也在想着这件事：“我反复思考我去这个阴森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使命。当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一度力图扼死它，并且直到希特勒上台，我一直把它看成是自由文明的死敌。我现在对他们该说些什么呢？素有文学才能的韦维尔将军把这一切都写在一首诗里，并在头天晚上给我看了。这首诗里有几组四行诗，每组的最后一行都是：‘1942 年不会有第二战场’。这简直是再往北极运去一个巨大的冰块。尽管如此，我深信，我应亲自把事实告诉他们，并就所有这一切与斯大林面谈……”^③。访问莫斯科之后，丘吉尔写信给美国总统说：“这次出访是我的一个义务。俄国人现在知道了最坏的消息……”^④。

试问，如果就 1942 年内开辟第二战场没有达成过郑重的协议，大不列颠首相何必决定作这次长途跋涉？为什么他飞往莫斯科时如此思虑重重？他又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如此令人不快？

很清楚，我们的英美盟国既然背弃了在 1942 年内开辟第二战

① 温·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4 卷，伦敦 1951 年版，第 305 页。

② 同上书，第 425 页。

③ 同上书，第 428 页。

④ 同上书，第 451 页。